

由內而外的道德瓦解：尤里·別茲梅諾夫的意識形態顛覆框架，以

中共愛國主義教育與資訊管制體系（1949-2026）為檢驗

Free China Movement

Version: v1.0 | 2026-10-20

© 2026 Free China Move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Canonical edition: <https://freechina.live/%e7%b9%81%e9%ab>

[%94%e4%b8%ad%e6%96%87-traditional-chinese/zh-hant-](#)

[bezmenov-demoralization-ideological-subversion-ccp-patriotic-](#)

[education/](#)

This documen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final published text. The

PDF is the authoritative download copy; the online edition above is

the version of record.

由內而外的道德瓦解：尤里·別茲梅諾夫的意識形態顛覆框架，以中共愛國主義教育與資訊管制體系（1949-2026）為檢驗

摘要

尤里·別茲梅諾夫（Yuri Bezmenov）是一名蘇聯叛逃者、前諾沃斯蒂通訊社記者，自稱曾為克格勃工作。他在 1980 年代初期提出，共產主義顛覆的決定性武器不是間諜活動，而是一個他稱為「意識形態顛覆」的緩慢過程；其第一個也是最漫長的階段——「道德瓦解」——需要十五至二十年，即教育一代人所需的時間。他聲稱，一個被道德瓦解的人「無法評估真實資訊」：事實、文件和照片再也觸及不到他，因為他感知現實的框架本身已經被改變。本文依據別茲梅諾夫的主要文獻——1983 年洛杉磯演講、1984 年接受 G. 愛德華·格里芬採訪，以及《給美國的情書》（*Love Letter to America*, 1984 年）——重建其框架，並逐條檢驗其與中國共產黨獨立文獻記錄的吻合程度。該記錄包括 1942-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1989 年之後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及其以受害敘事取代階級鬥爭敘事的做法、當代關於中國大陸審查邏輯的研究，以及 2021 年起習近平思想融入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材的實踐。本文發現兩者存在顯著但不完全的吻合，以及一個決定性的分歧：別茲梅諾夫描述的是一個在自由社會中活動的外部顛覆者，而在中國大陸，顛覆者本身就是主權統治者；道德瓦解不是運行了一代人，而是運行了三代；「常態化」不是過程的最終階段，而是其初始條件。本文還以 1989 年和 2022 年 11 月白紙抗議的證據，檢驗別茲梅諾夫最強的主張——不可逆性——並發現該主張言過其實：這一過程根深蒂固、制度化且自我強化，但同時受到挑戰且並不完整。結論認為，逆轉它同樣是幾代人的工作，並提出制度化的補救方案——開放檔案、真相委員會、受害者名錄和憲政史教育——這些都已在自由中國運動的政策工作中提出。

關鍵詞：尤里·別茲梅諾夫；意識形態顛覆；道德瓦解；愛國主義教育；思想改造；審查；歷史記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中華民國（台灣）

1. 引言：當事實不再說明任何事

每一位在黨國體制下從事異議的實踐者都熟知這樣一種經驗。你向一個完全在該國體制內受教育的人呈示一個有文獻依據的事實——一個日期、一張照片、一份傷亡記錄、一份法院判決——而這個事實卻落不到實處。它不是被審視後遭到駁回；它在抵達的瞬間就被重新歸類。文件是偽造的，照片是擺拍的，消息來源懷有敵意，提問本身就是不忠。爭論在開始之前就已經結束，不是因為證據薄弱，而是因為本該權衡證據的那個官能已經被預先佔領了。

尤里·別茲梅諾夫為這種經驗命名，並給出了機制。別茲梅諾夫（1939-1993）曾為蘇聯諾沃斯蒂通訊社工作，據他本人的說法，也曾為克格勃工作；1970年，他從蘇聯駐印度新德里使團叛逃，定居西方。在1980年代初期的演講和著述中，他主張克格勃約百分之十五的精力用於間諜活動，其餘則用於一個緩慢、公開的意識形態顛覆過程，其目的是「將每一個美國人對現實的感知改變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儘管資訊充裕，卻沒有人能夠為了捍衛自己、家人、社區和國家而得出明智的結論」。^[1]

他今天流傳的言論大多是病毒式傳播的碎片——短視頻片段、引文圖片、各種語言的轉述。這些碎片政治能量十足，學術可靠性卻大致成反比。因此本文做兩件病毒版本沒有做的事。

首先，回到原始文獻，重建別茲梅諾夫到底說了什麼、按什麼順序、附帶什麼限定、用什麼文字表述，以及不同講述版本之間存在哪些文字差異。其次，將他的框架不是當作啟示，而是當作假設，放到一個他本人沒有分析過的案例上加以檢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在那裡，統治國家的政黨同時擁有學校、審定教材、發放媒體牌照並運行審查機器。

由此產生三個研究問題：

1. 別茲梅諾夫的模型到底是什麼——它的階段、時長、機制和終點主張？
2. 有文獻記錄的中共實踐——思想改造、愛國主義教育、教材政策、審查——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該模型，又在何處分歧？
3. 他的終點主張是否成立：已經完成的道德瓦解，在受影響的一代人內部是否不可逆，只有通過教育新一代才能逆轉？

本文的方法是證據分級。A級證據包括原始文件和官方文本。B級包括同行評議或大學出版社的學術著作。C級包括叛逃者和親歷者的證言，包括別茲梅諾夫本人：可以用來證明證人說過什麼、相信什麼；用於證明機構事實時，僅在有獨立佐證的情況下才可採信。D級——病毒式引文圖片、無出處的轉錄、社交媒體轉述——僅用作該框架今日接受狀況的證據，從不用作事實主張的證據。本文關於中共實踐的任何事實主張，都不單獨建立在別茲梅諾夫一人之上。

2. 經過認證的別茲梅諾夫文獻集

三份原始文獻承載了該框架。

第一份是1983年在洛杉磯發表的一場演講，有視頻留存，別茲梅諾夫在其中闡述了意識形態顛覆的四個階段，以及「被道德瓦解的人」段落的早期形態。第二份是1984年接受G. 愛德華·格里芬的採訪，出版為《蘇聯對自由世界新聞界的顛覆》（*Soviet Subversion of the Free World Press*），其中包含了最完整的口頭版本。第三份是他的著作《給美國的情書》（*Love Letter to*

America, 洛杉磯, 1984 年), 以其掩護姓名托馬斯·大衛·舒曼出版, 以印刷形式呈現該框架, 並附有一張為各階段標定時長的圖表: 道德瓦解, 十五至二十年; 動盪化, 二至五年; 危機, 二至六個月; 常態化, 無限期。[2]

「被道德瓦解的人」段落, 1984 年採訪版本的原文如下:

「如我之前所說, 接觸真實資訊已經不再重要。一個被道德瓦解的人無法評估真實資訊。事實對他什麼都說明不了。即使我用資訊、用真實證據、用文件、用照片向他狂轟濫炸。即使我強行把他帶到蘇聯, 帶他去看集中營, 他也會拒絕相信——直到他的肥屁股挨上一腳。當軍靴踩碎他的睪丸, 他才會明白——但在此之前不會。這就是道德瓦解處境的悲劇。」[3]

兩個文字上的注意事項對後面的章節很重要。第一, 該段落存在不同版本: 1983 年演講版本較短, 現代引文集常常不動聲色地將兩者拼接。本文引用 1984 年採訪版本, 並將較短的形式視為它的節略。第二, 別茲梅諾夫的生平和體制主張——他本人的級別、克格勃精力十五比八十五的劃分、到 1984 年美國道德瓦解的完成度——屬於 C 級證言。其中一些在大體輪廓上可信, 與有文獻記錄的蘇聯「積極措施」實踐一致; 但若沒有本文給予的分級, 不應將其當作既定事實重複。沒有疑問的是文本本身: 這就是他在 1983-1984 年、在記錄在案的情況下說過的話, 早於網際網路讓他出名。這使得該文獻集可以按本文的方式使用——作為一個有日期、有署名的模型陳述, 出自一個在他本人敘述中運行該模型的體系的叛逃者。

還有一個關於接受史的提醒。四十年後的今天, 別茲梅諾夫成了某些受眾的先知人物, 他們把「道德瓦解」當作解釋一切政治分歧的萬能答案。這種用法本身是對其觀點的小小印證, 也是大大的扭曲。他的模型命名了一個具體機制——由國家主導、針對感知而非觀點、以一代人為長度的再教育——一旦被拉伸到「和我意見不同的人都被洗腦了」的意思, 它就失去了一切分析價值。第七章會回到這個界限, 因為一個能解釋一切的框架什麼都解釋不了; 只有在框架也可能失敗的前提下, 本文對中共案例的檢驗才有意義。

3. 框架重建

別茲梅諾夫的模型有四個要素。

定義。意識形態顛覆, 又稱積極措施或心理戰, 是將目標人群對現實的感知改變到如下程度的過程: 儘管資訊充裕, 它卻無法為了自我防衛而得出明智的結論。注意目標是什麼: 不是相信某個具體命題, 不是效忠某個政黨, 甚至不是觀點。目標是感知——先於一切後續觀點、將世界預先分揀為「可信」與「荒謬」、

「忠誠」與「敵對」、「可見」與「不可見」的那套機制。控制了這套分揀機制的顛覆者不需要贏得辯論。他只需要決定哪些論點能被當作論點聽見。

階段與時長。道德瓦解（十五至二十年）通過教育、媒體、文化和宗教發揮作用，別茲梅諾夫強調，它要求至少整整一代學生在沒有有效制衡的情況下接觸顛覆者的框架。動盪化（二至五年）收窄到要害：經濟、對外關係、國防。危機（書中圖表為二至六個月；某些口頭版本壓縮到幾週）帶來權力和結構的劇烈變更。常態化（無限期）是隨後出現的犬儒式穩定，在一個把自己呈現為危機終結的新秩序之下。時長是該模型最獨特的特徵。道德瓦解之所以緩慢，是因為它的工作單位不是選舉週期或新聞週期，而是一屆屆的學生。

機制：程序化反應。談到被該過程塑造的人，別茲梅諾夫說：「他們被編程為以某種固定的模式思考和對某些刺激作出反應。即使你讓他們接觸真實資訊，你也改變不了他們的心。即使你證明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你仍然改變不了基本的感知和行為邏輯。」[4]「被編程」一詞應按本文的分析意義理解，而非技術意義：是一種通過多年學校教育和媒體環境習得的條件反射式默認，在反思之前就已觸發，因此幾乎從不遭遇反思。

終點主張。別茲梅諾夫在終點提出了兩個強主張。第一是代際內不可逆：對被道德瓦解的人而言，接觸真實資訊「已經不再重要」，改變需要「另一代」以不同方式受教育的人。第二是關於目標社會中顛覆者的早期合作者——協助該過程、指望繼承權力的活動家、學者和宣傳者。他在採訪中預言，新秩序到來之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將被消滅，因為他們的幻滅一旦到來，會使他們成為新秩序最危險的敵人。[5]這兩個主張都可以檢驗，只是方式不同；第五章和第七章將用中共的記錄檢驗它們，而不是預設它們成立。

在檢驗開始之前，必須強調原模型的一個結構特徵，因為中國大陸的案例恰好把它反轉了。別茲梅諾夫的顛覆者是外部的、不被承認的：一個在開放社會內部活動的外國情報機構，利用該社會自身的自由——它的大學、報刊和娛樂業——作為投送系統。而在中國大陸的案例中，幾乎一切都相反：顛覆者就是政府，過程是官方的、強制性的，投送系統不是被利用的自由，而是國家壟斷。第五章的問題是：當這一個變量被翻轉，模型會發生什麼。

4. 別茲梅諾夫之前：中共的思想改造，1942–1976

中共並不需要一本蘇聯手冊才發現感知可以被重新設計，它的實踐比別茲梅諾夫的描述早了四十年。本章有意簡短：它確立的是先後順序，而非完整歷史，也不提出新的檔案主張。

模板在延安奠定。整風運動於1942年2月正式發起，讓幹部和知識分子經歷學習、交代、批評與自我批評、幹部審查的循環，最終收斂到一條唯一正確的路線

和唯一的正確解釋者。[6]這些手法——集體學習指定文本、書面自我檢查、公開交代思想錯誤、組織結論——成了一種可重複使用的政治技術；黨掌握國家政權後，它被遠遠推廣到戰時根據地之外。

1949 年之後，這項技術被推廣到新國家的全體受教育人口。1951-19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發端於周恩來總理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思想之後，要求教師和大學教職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拋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人民日報》所稱的「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受過海外訓練的知識分子被迫交代自己作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渠道的角色；課程按蘇聯模式重組，被判定為偽資產階級的學科——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被撤銷。[7]思想改造（*sixiang gaizao*）及其後來較溫和的行政後裔思想工作（*sixiang gongzuo*），命名了一種連續的制度實踐：黨聲稱管轄的不僅是行為，還有產生行為的內在框架。

其後的運動——1957 年的反右運動，摧毀了在百花齊放時期發過言的許多知識分子；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關閉大學，把一代學生下放到農村，使儀式性批判成為群眾性經歷——在本章需要的那一點上屬於同一譜系：它們以獎賞和恐怖教會了體制內感知的實用規則。什麼可以說；什麼在公開場合不能記住；哪些受害者算數，哪些不算；哪些問題會標記提問者。一個人口並不需要在私下相信官方敘述，這些規則就能生效。它只需要早早地、徹底地學會第三章所說的分揀機制：哪些事實能被當作事實聽見。

這份早期記錄與別茲梅諾夫模型已經出現兩個差異，兩者都對檢驗很重要。第一，早期的中共運動是強制性、運動式的——以運動整風，恐怖是其內在工具——而別茲梅諾夫描述的道德瓦解是緩慢的、大體非暴力的，依賴目標的自由。中國大陸的體制後來確實獲得了別茲梅諾夫描述的那種緩慢的、課程化的形態，但它從未放棄強制形態；它同時持有兩者。第二，目標從一開始就是內部的。中共不是在顛覆敵對社會；它是在重塑自己的社會。在中國大陸，道德瓦解是統治技術，而非滲透技術。

5. 1989 年之後的系統化：愛國主義教育運動

如果說有一個時刻把這份繼承下來的實踐轉化為現代的、以一代人為長度的教育體系，那就是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後。那年春天，北京和數百個其他城市的學生和市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被黨國以軍事力量終結——在領導層自己的事後檢討中，是一次教育失敗。鄧小平本人的事後檢討也指向同一方向。他在 1989 年 6 月 9 日的講話中，把抗議歸因於未能堅持黨的領導、對西方價值觀念上的鬆懈，並要求在年輕人中鞏固黨的正統；在他總結的動亂教訓中，他直接下達指示：「要加強思想教育。」鄭王（Zheng Wang）對這一時期的記述補充了領導層更尖銳的自我批評——黨在教育上的失敗，忽視了教育年輕人中國曾經是什麼、革命付出了什麼代價，是一個嚴重的錯誤。[19]補救之道不是舊式運動型的運動，而是一套課程。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於 1991 年發起，並以 1994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法典化，明確以青少年為對象。[8]趙穗生在奠基性研究中，把結果稱為「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一場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重建黨的權威的運動，其方式是在愛國主義而非階級鬥爭的基礎上重建合法性。[9]

鄭王的《勿忘國恥》（*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2 年）詳細記錄了其機制。[10]該運動在教給每個學童的官方歷史敘事中，完成了三個相互關聯的替換：

1. **從階級鬥爭到民族鬥爭。**中國大陸現代史的組織性衝突不再是內部的——地主對農民、資本家對工人——而變成了外部的：中華民族對曾經羞辱它的外國列強。
2. **從勝利者敘事到受害敘事。**舊的毛主義敘事——黨贏得了民族獨立、讓民族站了起來——被一個以西方和日本之手造成的「百年國恥」為中心的敘事取代；只有作為民族救星和持續保衛者的黨，才能回應並洗雪這一創傷。
3. **從教材到總體環境。**該敘事不僅制度化於改寫的歷史教材——從 1992 年起，高中和初中都要求使用，並納入大學入學考試——還制度化於博物館、紀念碑和全國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網絡：一百個全國「示範基地」，其中四十個，鄭王指出，位於與外國衝突的紀念地。[11]

對照第三章，該運動與別茲梅諾夫機制的對應很緊密，應該直說。該運動的工作單位是學生群體。它明示的對象不是一套觀點，而是一種歷史意識——鄭王所說的「受選—神話—創傷複合體」——在學生擁有任何獨立核查手段之前就安裝進去，並以獎勵複述的考試不斷刷新。它的內容經過設計，使得在其中成長的人，此後會把對黨的批評感知為不是有待權衡的政治立場，而是民族屈辱的重演：批評者在聽者的先驗框架中，自動與傷害民族的外國勢力歸為一類。這就是別茲梅諾夫的程序化反應，只不過生產它的不是利用開放社會的外國情報機構，而是一個運行強制教育的教育部。

袁偉時的案例顯示了該系統如何防禦內部的例外。2006 年，中山大學歷史教授袁偉時在《中國青年報》週日副刊《冰點》發表文章，批評中國大陸教材教授不完整的歷史，助長盲目民族主義和封閉排外的思維；他用一句後來廣為流傳的話形容年輕一代——吃狼奶長大的。兩週之內，該副刊被停刊，編輯被撤職。

[12]這個插曲很小，因而有用。沒有外國顛覆者涉入。一位有資歷的體制內人士試圖在一份黨報上糾正感知框架的源頭——教材——而系統的回應是關閉這個場地。由內而外的道德瓦解保護自己的課程，方式正如別茲梅諾夫筆下的顛覆者保護自己的行動：不是回答糾正，而是終結糾正得以被聽見的條件。

本章的主張應該像提出時那樣謹慎地限定。愛國主義教育不等同於蘇聯的意識形態顛覆，它的許多要素——民族歷史、紀念場所、公民自豪感——在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物，包括中華民國（台灣）和美國。本文指出的差異不在於愛國內容的存

在，而在於四個條件的合流，這四個條件在開放社會中不會同時成立：單一的官方敘事；壟斷的供給者（不允許有競爭的教材、報刊或平台系統性地反駁它）；以考試和就業激勵複述；以及對公開糾正的懲罰——袁偉時案及此後眾多案例都已證明。在這四個條件之下，歷史教育在功能上就變成了別茲梅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未來資訊得以被評估之前，先在幾代人身上安裝感知框架。

6. 數字與習時代的延伸

如果成人的資訊環境每天都與之矛盾，學校安裝的框架就會衰減。在中國大陸不會，因為第二套系統——資訊管制——承擔了維護工作。兩組證據描述了它的運作方式。

第一組是實證審查研究。蓋瑞·金、詹妮弗·潘和瑪格麗特·E. 羅伯茨分析了在被審查前截獲的、來自近 1400 個服務的數百萬條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帖子，發現審查計劃的主要目標不是對國家、領導人或政策的批評：即使言辭激烈的批評，本身也不更可能被刪除。無論親政府還是反政府，被刪除的是代表、強化或煽動集體行動的內容——正在發生的社會動員，或未來可能發生的社會動員。[13]這一發現是對別茲梅諾夫的精煉，而不只是印證。系統的最高優先不是讓每個臣民相信官方敘述；而是防止臣民在公開場合發現別人也和自己一樣不信——讓一個私下裡被道德瓦解或私下裡持異議的人口，在公開場合保持原子化。感知在學校被治理；表達在網上被治理；兩者的結合部是集體行動，而第二套系統的存在就是為了預先阻止它。

第二組證據是習近平時代意識形態教育以個人化形式重返課程中心。2021 年 7 月，國家教材委員會和教育部發佈指導綱要，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入各級教材；從 2021 年秋季學期起，中國大陸各地中小學開始使用五卷本習近平思想學生讀本，從小學低年級到大學分級編寫；2023 年 8 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被增列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14]委員會陳述的理由本身就是本文論點的 A 級表述：教材「體現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意志，直接影響人才培養的方向和質量」，小學應當在學生中「培育對黨、國家和社會主義的熱愛與正確認識」。[15]

把這兩重延伸並列，到 2021-2023 年，中國大陸的體制滿足了一種別茲梅諾夫從未用於任何國家的描述，包括他自己的國家。他描述的蘇聯體制，在國外搞道德瓦解的同時，國內人口靠宣傳加恐懼的粗糙混合來控制；它在一個長壽命之內就崩潰了。中國大陸的體制則把三者結合起來：（一）童年安裝、考試強制執行的強制性歷史敘事；（二）審查機器，其經實證證明的優先目標是阻止集體表達而非糾正私人批評；（三）一位領導人的學說，被具名寫進每一級學校的教材。這就是有了部委、預算、考試大綱和防火牆的道德瓦解——不是針對敵人實施的，而是作為統治者臣民的日常教育實施的，並且為每一屆新生以例行行政而非運動的方式更新。

7. 框架檢驗：吻合之處、斷裂之處與倒置之處

吻合之處。中國大陸的記錄以別茲梅諾夫的美國材料從未達到的精確度，證實了框架的核心機制。感知框架在童年通過強制性的、以考試獎勵複述的敘事安裝（第五章）；在成年通過一套資訊系統維護，該系統經證明的優先目標是阻止集體表達而非糾正私人信念（第六章）；它的典型產物正是別茲梅諾夫預言的那種反應——不是有理有據的分歧，而是把不合意的事實預先重新歸類為外國的、偽造的或不忠的。時長論也吻合，而且有過之：別茲梅諾夫要求十五至二十年塑造一代人，中國大陸的體制已經連續塑造了三代，每一代都由上一代塑造出來的人教育。

倒置之處。原模型的兩個要素在中國大陸案例中反轉。第一，主體：顛覆者不是外部的，也不利用目標社會的自由；它是主權者，通過強制運作。第二，順序：常態化——一個危機後秩序把自己呈現為永久穩定之下的統治——不是過程走向的終點；自 1949 年以來它一直是基線條件，每一輪新的道德瓦解都在其中作為例行治理實施。一個為滲透設計的模型，遇到掌握教育部的滲透者時，必須重新表述，而不能直接套用。

合作者主張須謹慎處理。別茲梅諾夫預言，顛覆者的早期幫手在其利用價值耗盡後會首當其衝被消滅，因為他們的幻滅會使他們變得危險。中國大陸的歷史提供了與此押韻的插曲——1956-1957 年響應百花齊放邀請的知識分子，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摧毀；每一場運動的盟友都被下一場運動拋棄——但押韻不是普遍規律的證明，本文不把別茲梅諾夫的預言提升為規律。可以站得住腳的主張更窄，且有文獻依據：一個獎勵告密、懲罰獨立判斷的體制，會在其工具的獨立判斷比利用價值活得更久時，可靠地反噬自己的工具。這是激勵結構的屬性，不是預言。

斷裂之處：不可逆性。別茲梅諾夫最強的主張也是它最弱的一環，而中國大陸本身兩次提供了反證。1989 年，在經歷四十年思想改造、按他的說法一代被塑造的人本該已經不可觸及時，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陸公民——走在最前面的是完全在體制內受教育的學生——佔領全國各地的公共空間，要求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和問責的政府。體制用軍隊回答，這在政權自己的行為中承認了教育並沒有完成它的工作。

2022 年 11 月，它以一種直接評論本文主題的形式再次發生。烏魯木齊一棟被封控的公寓樓發生致命火災後，數千人走上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這是自 1989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全國性示威，抗議清零政策，高呼「我們要人權」「共產黨下台」，舉起白紙作為審查的象徵——白紙抗議。[16]一張白紙正是道德瓦解狀態的精確否定：一個再也不能說出心中所想的公民，轉而公開展示自己被禁止言說這個事實，而每一個看到的人都懂。這是在為癱瘓它而設計的條件下正確運作的感知。抗議被鎮壓，參與者被拘留，有人被判刑——而國家的清零政策在幾天之內就被放棄。因此，根據證據，中國大陸的道德瓦解最好描述為：根深蒂固、制度化、不斷自我更新——同時不完整、受到挑戰，並且在親身經歷

（一次封控、一場大火、一隻靴子，用別茲梅諾夫自己殘酷的意象）在大規模上與安裝的框架矛盾時，能夠突然公開失效。

這一發現的意義超出學術準確性。如果該過程在一代人內部真的不可逆，唯一理性的回應就是絕望或等待。正因為它不完整，補救才是一個實際問題；最後一章轉向的正是補救——表述為制度，而非口號。

8. 擬議解決方案：重建判斷官能

別茲梅諾夫自己的邏輯規定了任何補救的第一原則，也排除了最常見的那一種。如果受傷的是評估資訊的官能，那麼僅僅提供更多資訊——更多事實、更多文件、更多照片——不可能是解藥，因為那等於把受損的官能當作完好的官能來對待。補救必須重建官能本身：來源批評、邏輯推理、歷史記憶和比較判斷的習慣，公民憑此在決定是否相信之前先分揀一個主張。而既然傷害是幾代人、制度性的，補救也必須是幾代人、制度性的。本章提出一個五部分方案。它的要素並非在此發明：前兩個重述自由中國運動已經發表的政策，第三個引用並發展該運動現有的公民教育項目——那個非同尋常地已經存在、已經在線上運行的補救基礎設施。

8.1 打開檔案，說出受害者的姓名，把真相載入史冊

自由中國運動 10 月 1 日政策提案——主張由未來經民主授權的立法機關把這一天重定為「受難與自由全國紀念日」——規定了制度核心：「全國受害者名錄和數字檔案；開放黨和國家檔案；獨立真相委員會；國家紀念館和公共教育；以及對經核實的受害者的賠償、平反和司法救濟，個人責任基於證據和正當程序，而非集體懲罰。」[18]

每個要素都回答道德瓦解的一個具體要素。開放的檔案在根子上回答敘事壟斷：黨的歷史只有在能證偽它的文件都被列為機密時，才能被當作唯一的歷史來教授。受害者名錄回答決定哪些受害者算數的分揀機制：它把他們一個不漏地、以姓名、憑證據計入。真相委員會回答程序化反應——把事實反射性地重新歸類為不忠——它創造一個權威的公共場域，讓事實在全社會面前先被當作事實聽見，經正當程序檢驗。這一切都不是事實傾倒，而是在建設這樣的制度：它的日常運作通過參與，訓練公民評估證據。

8.2 在防止新壟斷的條件下改革教材

教材改革是顯而易見的補救，也是危險的補救：一個過渡政府如果只是把黨的官方敘事換成自己的，就會在新的管理層之下複製道德瓦解的結構。因此保障措施是提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後的補丁：（一）競爭性教材，按公開的事實標準審

定，不設唯一的官方文本；（二）基於來源的歷史教學，學生從文件——包括相互矛盾的文件——出發，而不是從結論出發；（三）明確教授被壓制的記錄，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 1989 年，用與其他議題相同的證據標準；（四）考試改革，使考核獎勵對來源的評估而非對敘事的複述。成功的尺度不是下一代相信了另一套命題，而是它能說出一個命題如何被確立，並在命題未被確立時說出來。

8.3 作為補救的公民教育：CCE-100 計劃

事實需要官能；官能靠練習建成，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練。這就是自由中國運動公民教育項目的設計——《政治迷思一百問：民主、自由、人權與現代公民》

（CCE-100），發表在自由中國運動網站的公民教育目錄（<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該項目陳述了自己的方法，而方法本身就是反道德瓦解教學的典範：

「以下 100 個條目為研究問題，不代表已證實的政治宣傳原文或既定結論。每個問題都將經過原始論述收集、事實核查、比較研究與獨立審稿，正式文章經編輯批准後將逐條添加鏈接。」[17]

一套從問題而非結論出發、並把驗證方法與結果一同公佈的課程，訓練的正是黨的課程意在癱瘓的那個官能。它的十章直接對應本文第五章和第六章記錄的症狀：

道
德
瓦
解
症
狀
（
本
文
）

CCE-100 補救對應

批
評
黨
被
感
知
為

第三章 — CCE-021：愛國與愛黨：愛國是否等於熱愛執政黨？ CCE-022：批評政府：批評政府是否等於不愛國或危害國家？ CCE-029：國家與政府：國家、政府與執政黨是同一回事嗎？

道德瓦解症狀（本文）

不愛國、受外國指使

歷史失憶；被壓制的事件不可言說

無法評估官方或外

CCE-100 補救對應

第五章 — CCE-045：大躍進：大躍進的歷史真相與責任歸屬是什麼？ CCE-046：文化大革命：文革為何發生？如何防止悲劇重演？ CCE-047：六四事件：1989年發生了什麼？為何保存記憶如此重要？ CCE-050：檔案公開：歷史檔案公開對真相與和解有何意義？

第九章《宣傳、資訊與邏輯》 — CCE-081：官方媒體核查：如何核查官方媒體發布的信息？ CCE-082：外國媒體核查：外國媒體報道可信嗎？如何交叉驗證？ CCE-085：審查與謠言：信息審查與謠言傳播之間是什麼關係？ CCE-086：信息繭房：算法推薦如何塑造人們的政治認知？ CCE-087：因果推理：如何區分相關關係與因果關係？常見的因果謬誤有哪些？ CCE-088：政治口號：政治口號如何影響思維？如何解剖一句口號？ CCE-090：數字引文核查：統計數字與文獻引

道德瓦解症狀（本文）
國資訊
相信普通公民無法評判政治
沒有可運作的替代模式的親身經驗

CCE-100 補救對應

文應如何核查？

第一章 — CCE-005：選舉能力：普通公民是否具備做出理性政治選擇的能力？第十章 — CCE-091：權利與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應包含哪些權利知識？ CCE-100：公民責任：現代公民應承擔哪些政治責任？

第七章 — CCE-061：台灣民主化：台灣民主化轉型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CCE-062：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在台灣的實踐說明了什麼？ CCE-069：轉型道路：從威權向民主轉型的路徑有哪些？

有兩個特點使 CCE-100 不只是一份為假設的未來準備的大綱。第一，它現在就

在運行——目錄已發表，條目在製作中，完成的文章經批准後從目錄逐條鏈接——因此今天就能觸及補救已經可以觸及的受眾：海外華人、防火牆外的學生、翻牆的中國大陸讀者。補救不必等到轉型才開始；按別茲梅諾夫自己的時間表邏輯，現在就為正在上學的這一代啟動十五至二十年的時鐘，正是全部要點。第二，它的「問題優先」方法是第 8.2 節後轉型課程的現成模板，因為它在實踐中演示了公民教育與反宣傳的區別：反宣傳安裝一個對立的敘事；公民教育安裝一種方法，並接受隨之而來的風險——這也是它誠意的證明——即裝備了方法的公民可能得出教育者沒有預料的結論。

8.4 恢復一個判斷力得以行使的資訊環境

公民教育經不起與一套為原子化它而設計的資訊系統的接觸。第六章的審查發現精確規定了改革目標：一個以壓制集體表達為優先的系統，必須被一個把集體表達作為公共主張常態檢驗的系統取代。具體而言：廢除防火牆和出版前審查；依法而非按黨的指令獨立發放媒體牌照；以平台透明義務取代平台審查義務；以法律保護現行體制最可靠地懲罰的那些行為——報導、存檔、紀念和組織。順序很重要。一個經第 8.3 節訓練的公民，如果回到舊規則治理的環境，會比任何課程教新課更快地重新學會舊課——判斷是危險的，沉默是安全的。

8.5 順序與時間表：一代人，逆向而行

別茲梅諾夫唯一經久的洞見是時間表，補救應該接受它，而不是承諾機制不允許的更快結果。**即刻，且已經開始：**保存——檔案複製並保存在黨夠不著的地方，證言在證人還在世時錄下，公民教育在線上製作和閱讀（CCE-100）——使再教育的材料無論發生什麼都存在。**在轉型時：**第 8.1 節的制度（檔案開放、受害者名錄、真相委員會）和第 8.4 節的法律改革，它們需要國家權力，必須由經民主授權的機構頒布，正如 10 月 1 日提案本身所規定的。**在隨後的一代人中：**第 8.2 節的教材安排和第 8.3 節學校裡的公民課程，考核標準不是態度調查——一個受驚的人口可以被訓練通過它——而是官能本身可觀察的恢復：無懲罰地反駁政府的報刊、判決國家敗訴的法院、結果事先不知道的選舉，以及聽到不合意的事實時先問「它是不是真的」的公眾。

最後的檢驗是本文的，也是別茲梅諾夫的，用一句話說。道德瓦解完成之時，是事實不再說明任何事之日。它逆轉之日，是事實重新開始說明什麼之日——而每一個被打開的檔案、每一個被說出姓名的受害者、每一個被誠實提出、誠實回答的一百個問題，都在可度量地催促那一天到來。

結論

用中國大陸的記錄檢驗，別茲梅諾夫的框架以修正後的形式存活。修正後，它是這樣說的：一個壟斷教育和資訊的執政黨，可以在幾代人身上損害一個人口評估真相的官能——不是徹底的，不可逆的，也不是不費持續的制度努力的；這正是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新教材和新審查系統仍在做這項工作的原因。別茲梅諾夫的病毒版本邀請人對被這種體制塑造的人絕望或蔑視。證據不支持這兩者。它支持工作：保存、說真話和公民教育的緩慢的、制度性的、幾代人的工作——現在就開始，必要時在流亡中和線上開始；等到檔案終於能打開時，在自由中國的學校裡完成。

註釋

1. 尤里·別茲梅諾夫接受 G. 愛德華·格里芬採訪，《蘇聯對自由世界新聞界的顛覆》（*Soviet Subversion of the Free World Press*, 1984 年），轉錄文本：意識形態顛覆的定義。
2. 托馬斯·大衛·舒曼 [尤里·別茲梅諾夫]，《給美國的情書》（*Love Letter to America*, 洛杉磯：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年），第 23 頁圖表：四個階段及時長。
3. 別茲梅諾夫，1984 年格里芬採訪，轉錄文本，道德瓦解段落。1983 年洛杉磯演講中有較短的變體。
4. 別茲梅諾夫，1983 年洛杉磯演講，轉引自《大思考》（*Big Think*）基於轉錄文本的記述，「39 年前，一位克格勃叛逃者令人不寒而慄地預言了現代美國」（2018 年，更新）；C 級證言，措辭如該文所載。
5. 別茲梅諾夫，1984 年格里芬採訪，轉錄文本：論合作者「被標記滅絕」及新秩序的心理衝擊。
6. 中共中央《關於整頓三風的決定》（1942 年 2 月）；延安整風運動（1942–1944 年）的標準記述。
7. 思想改造運動，1951 年 9 月開始，起於周恩來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講話；《人民日報》對高校教職員的號召；手法包括灌輸、鬥爭會、宣傳、批評與自我批評，綜合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改造（*sixiang gaizao*）的標準參考記述。
8. 愛國主義教育運動，1991 年發起；中共中央宣傳部《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1994 年）。
9. 趙穗生，「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後天安門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共產主義與後共產主義研究》第 31 卷第 3 期（1998 年）：287–302。doi:10.1016/S0967-067X(98)00009-9。
10. 鄭王，《勿忘國恥：中國政治與外交中的歷史記憶》（*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鄭王，《勿忘國恥》，第4章：1992年起的教材、大學入學考試內容、博物館及100個全國示範基地（40個位於與外國衝突的紀念地）。
12. 袁偉時，發表於《冰點》（《中國青年報》副刊）的文章，2006年1月；兩週之內副刊被停刊、編輯被撤職，見當時報導及愛德華·維克斯（2009年）、格雷戈里·費爾布拉澤（2004年）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綜述。
13. 蓋瑞·金、詹妮弗·潘、瑪格麗特·E. 羅伯茨，「中國的審查如何容許批評政府卻壓制集體表達」，《美國政治學評論》第107卷第2期（2013年5月）：326-343。doi:10.1017/S0003055413000014。
14. 教育部／國家教材委員會指導綱要（2021年7月），習近平思想融入各級教材；2021年秋季起中小學習近平思想學生讀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2023年8月增列為高校思想政治教材。
15. 國家教材委員會，2021年教材指導綱要配套聲明，轉引自BBC新聞「中國學校：『習近平思想』進入課程」（2021年8月25日）及《中國日報》。
16. 人權觀察，「中國：釋放『白紙』抗議者」（2023年1月26日）及「白紙抗議的遺產」（2025年11月23日）：2022年11月抗議，起於2022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白紙象徵、口號、拘留，及隨後清零政策的放棄。
17. 自由中國運動，公民教育（CCE-100），《政治迷思一百問：民主、自由、人權與現代公民》，目錄，<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引言與章節目錄（CCE-001-CCE-100），2026年10月20日訪問。
18. 自由中國運動，「10月1日——受難與自由全國紀念日」，政策提案（2026年9月20日），及新聞稿「自由中國運動呼籲把10月1日定為受難與自由全國紀念日」（2026年9月30日），<https://freechina.live/english/english-press-releases-statements/press-release-october-1-national-day-suffering-freedom/>
19. 鄧小平，在北京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鄧小平，關於1989年動亂教訓的談話（「國家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1989年談話，見《鄧小平文選》），論加強思想教育。鄭王對領導層教育自我批評的總結：鄭王，《勿忘國恥》，引言及第4章。

相關研究

- 《從毛到黨國：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演變與憲政民主的重建》——<https://freechina.live/governance-public-policy/third-republic-governance-blueprints/mao-party-state-october-1-prc-constitutional-evolution-democratic-restoration/>

- 公民教育（CCE-100）：《政治迷思一百問》——<https://freechina.live/civic-education-100-questions/>

其他語言版本（簡體中文、Français、Deutsch、Español）正在籌備中。

版本：v1.0 | 2026-10-20